


“中国语言文学”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变异有声数据库建设”(12&ZD177)阶段性成果

莫 娟◎著

常 熟 方 言
音 韵 演 变 研 究

CHANGSHU FANGYAN YINYUE YANBIAN YANJIU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常熟方言音韵演变研究

莫 娟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熟方言音韵演变研究 / 莫娟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672 - 2743 - 9

I. ①常… II. ①莫… III. ①吴语—音韵学—方言研究—常熟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9657 号

书 名: 常熟方言音韵演变研究

作 者: 莫 娟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 箱: sdcbs@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207 千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743-9

定 价: 40.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7481020



目

录

- 第一章 绪 论 / 1
- 第一节 常熟地理历史概况 / 1
- 第二节 常熟方言概况 / 4
- 第三节 研究缘起 / 6
- 第四节 相关研究简介 / 8
- 第五节 研究方法、材料及发音合作人简介 / 14
- 第二章 常熟方言语音概况 / 18
- 第一节 常熟方言语音系统 / 18
- 第二节 常熟方言声韵调配合表 / 27
- 第三节 常熟方言音变 / 44
- 第三章 常熟方言声母的历史演变 / 53
- 第一节 唇音声母 / 53
- 第二节 牙喉音声母 / 55
- 第三节 舌齿音声母 / 64
- 第四节 声母小结 / 83
- 第四章 常熟方言阴声韵的演变 / 84
- 第一节 果摄韵母 / 84
- 第二节 遇摄鱼韵和虞韵 / 88
- 第三节 假摄麻韵和蟹摄佳韵 / 92
- 第四节 蟹摄和止摄 / 96

第五节 流摄侯韵和尤韵 / 98

第六节 古阴声韵的分合 / 101

第五章 常熟方言阳入声韵的演变 / 104

第一节 宕摄与江摄 / 104

第二节 梗摄与曾摄 / 107

第三节 通摄 / 111

第四节 古阳入声韵的分合 / 113

第六章 常熟方言声调的历史演变 / 119

第七章 常熟方言的内部关系 / 121

第一节 常熟方言内部的一致性 / 121

第二节 常熟方言内部的差异性 / 126

第八章 结 语 / 144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144

第二节 研究步骤与成效 / 146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147

附录一 常熟方言同音字汇 / 149

附录二 古知、庄、章组声母在常熟各方言点的读音调查表 / 169

附录三 知、章组舒声韵声母读音调查表 / 170

参考文献 / 172

后记 / 17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常熟地理历史概况^①

一 常熟地理交通

常熟位于东经 $120^{\circ}33'$ ~ $121^{\circ}03'$, 北纬 $31^{\circ}33'$ ~ $31^{\circ}50'$ 。地处长江下游南岸, 居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东邻太仓, 距上海 100 千米; 南接昆山、苏州相城区; 西连江阴、无锡市锡山区; 北濒长江黄金水道, 与南通隔江相望; 西北境与张家港接壤。全境东西间最长距离 49 千米, 南北间最长距离 37 千米, 总面积 1 276.32 平方千米(含长江界属水面)。

常熟境内地势低平, 海拔大多为 3 ~ 7 米。境内山丘主要有虞山、顾山、福山。其中以虞山为最, 海拔 261 米, 长 6 400 米, 东端蜿蜒入古城。境内水网交织, 各河流湖荡均属太湖水系, 其分布呈以城区为轴心向四乡辐射状, 东南较密, 西北较疏, 河道较小, 水流平稳。

常熟地处中纬度地区, 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年均总日照时数 2 130.2 小时, 年平均气温 15.4°C , 年均降水量 1 054 毫米。

常熟物产资源丰富, 农作物以水稻、小麦、棉花为主, 兼有部分油料作物、蔬菜、瓜果、药材等。特产有鸭血糯、宝岩杨梅、虞山绿茶、王庄西瓜、梅李南瓜、虞山水蜜桃、桂花栗子等。常熟又为水网地区, 水产资源十分丰富, 有出自长江的鲈鱼、鲥鱼、刀鱼、海白虾等, 有出自内河的鲫鱼、草鱼、鲢鱼、鳊鱼、青虾, 还有阳

^①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 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常熟市志(修订本)[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常熟市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6.

澄湖的大闸蟹等。野生植物资源有乔木、灌木、药材、草、蕈菌 5 大类 200 多种。野生乔木主要有紫檀、柘树；野生灌木主要有山楂、金樱子；野生药材有何首乌、蒲公英等 765 种；草类繁多，有芦苇、野燕麦等 20 多种；蕈菌类有松树蕈等。野生动物主要有哺乳类、鸟类 800 余种。

常熟市区虞山镇，西晋时为海虞县治所在地，唐初为常熟县城。城内有 7 条小河横列似琴弦，流入运河后通往长江，遂有“琴川”之称。元末明初腾山珠城，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形胜，山水交辉，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具。城内街巷民居与古典园林紧密相连，城外十里虞山与千顷尚湖相映成趣，形成了融山、水、城、园为一体的城市独特风貌。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抗日武装活跃的常熟沙家浜地区为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故事的发生地，更为常熟山川增添了传奇色彩。

常熟北濒长江，南近太湖，境内河流湖泊密布，旧时交通以水上为主，运输工具主要依靠木船。清末民初通行轮船后，渐次取代木船，成为客运主要手段；货运仍依赖人力木帆船，先后形成各类专业货运船帮。陆上交通，古有沿塘大路通往长江港口与苏州府毗邻诸县，客货运输均为人力或畜力车辆。清末，沿塘大路渐废。1935 年 8 月，锡沪、苏常两公路建成通车，始有现代化陆上交通运输手段。不久，因日军侵占县境，交通事业未有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市交通运输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日益发展，公路、航道、桥梁、港口以及航标、码头、车站等，均次第建设。

二 常熟历史沿革

新石器时代，常熟地方即有原始人类活动。现当代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实物遗存。

商末，周国国君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南来，建立勾吴。按《吴地记》有关古吴“北临大江”的记述，常熟地方为勾吴北境。

西周时，常熟地方属吴国。

东周时，公元前 473 年，越尽取吴地，常熟地方属越国。公元前 333 年，楚国灭越，属楚。公元前 248 年，楚黄歇封吴，改属黄歇封地。公元前 222 年，秦灭楚，属秦。

秦废分封，设郡县，常熟地方属会稽郡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封刘贾于吴称荆国，常熟地方属荆。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改封刘濞为吴王，属吴。汉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刘濞



封地撤,仍属会稽郡吴县。当时常熟地方有虞乡。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以会稽郡浙江以西之地建吴郡,常熟地方属吴郡吴县。当时常熟地方有南沙乡,置司盐都尉。

三国时,虞乡、南沙乡属吴国,隶吴郡吴县。吴黄武中(222—228年),虞乡置虞农都尉。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南沙乡割属毗陵郡暨阳县。太康四年(283年),分吴县虞乡,立海虞县,隶于吴郡。

东晋元帝时(317—322年),以海虞县北境,侨置郟、胸、利城三县,隶于侨置的东海郡。咸康七年(341年),在南沙乡设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永和年间(345—356年),侨置的郟、胸、利城三县及东海郡移京口。当时常熟地方属海虞县与南沙县,分隶吴郡、晋陵郡。

南北朝时,海虞、南沙两县均属南朝刘宋,仍分隶于吴郡、晋陵郡。南齐时(479—502年),分海虞县北境设立海阳县,隶于晋陵郡。梁天监六年(507年),以海虞、南沙、海阳等县统隶于新置的信义郡。大同六年(540年),于南沙之地置常熟县,仍隶于信义郡。

隋代,废信义郡,以海阳、前京、信义、海虞、兴国、南沙六县之地并入常熟县,隶属于苏州。开皇九年(589年),废晋陵郡,在常熟设常州理,旋移常州理于晋陵县。大业元年(605年),改苏州为吴州。大业三年(607年),改吴州为吴郡。常熟仍隶于吴郡。

唐代武德七年(624年),常熟县治由南沙城移至海虞城。隶属未变。

五代十国时,常熟属苏州。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苏州改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复为苏州。政和三年(1113年),改平江府,常熟均随属。

元代,隶平江路。元贞元年(1295年),常熟县升为常熟州,仍隶平江路。元末,为吴王张士诚隆平府属地。

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常熟州复为县,隶苏州府。

清代,常熟初属江南省苏州府,建江苏省后,属江苏省苏州府。雍正四年(1726年),划常熟县东境置昭文县。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占常熟、昭文,两县同属天朝苏福省。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退出,两县仍隶苏州府。宣统三年(1911年),常熟、昭文两县合并为常熟县。

1912年废府存县,常熟县属江苏都督府。1915年,设苏常道于苏州,常熟属之。1934年,江苏省划分行政督察区,常熟县先后隶于江苏省第三行政督察

区和第二行政督察区。1938年,隶于伪江苏省政府。1941年8月至194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苏常太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于常熟县境内并跨县先后建立常熟县、太仓县、苏州县、阳澄县、沙洲县、无锡县、虞西行署民主政权,分属苏南第一、第二行政区。1946年8月,抗战胜利,常熟县隶属江苏省江南行署,旋撤署,仍隶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以常熟县城区设市,市、县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熟县隶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苏州专区。1951年9月,常熟市由县辖升为苏州专区所辖。1953年1月撤苏南、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建江苏省。县、市隶于江苏省苏州专区。1954年11月,常熟市改为省辖市。1958年4月,撤常熟市,市境仍归常熟县管辖。1983年3月,撤常熟县的建置,以常熟全境建立常熟市(县级市),隶苏州市。

常熟市现有建置镇10个,分别是虞山镇、海虞镇、梅李镇、古里镇、碧溪镇、支塘镇、辛庄镇、沙家浜镇、尚湖镇、董浜镇。林场1个,行政村231个,居委会134个。另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各1个,省级招商城1个。

第二节 常熟方言概况

“吴语的内部异差,大而言之,南北不同;细而分之,城乡各异。”^①给吴语分区的工作前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常熟方言的归属在历次分区讨论中也是明确统一的:太湖片吴语,一般称为北部吴语。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9)一书把所调查的74个点分成四区,常熟被划进第二区(第二区包括:丹阳、金坛、溧阳、高淳、常州、宜兴、江阴、靖江、无锡、常熟、苏州、吴江、昆山、太仓、海门、启东、上海市、上海县、浦东、宝山、嘉定、川沙、崇明、南汇、青浦、松江、金山、奉贤28个点)。

《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许宝华、游汝杰,1984)一文中把上海和苏南地区的吴语分为东、西两大区,两大区内部各自又分若干小区:

西区:常州话

西1区:金坛话;西2区:常宜话

^① 颜逸明. 吴语概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3.



东 区:苏沪话

东 1 区:苏州话;东 2 区:太仓话;东 3 区:松江话;东 4 区:上海话

该文将常熟方言归入东区的东 2 区太仓话。这与旧府州辖区不相符(常熟旧属苏州府,东 2 区其他三地太仓、嘉定、宝山旧属太仓州)。但是从语音相似程度来说,这样的分区是符合语言事实本身的。因常熟方言内部就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当时分区所用的是常熟市区话,与苏州话差异较大;而常熟沙家浜、辛庄等毗邻苏州的地方,其语音受苏州话影响较大,与苏州话比较接近。

《吴语的分区(稿)》(傅国通等,1986)将常熟方言划入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常熟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常熟方言包括整个常熟市各镇的方言,而狭义的常熟方言是指常熟城区虞山镇话。常熟方言的内部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常熟方言的地域差异。我们粗略地将常熟方言分为三片:第一片,以虞山镇话为代表,包括藕渠、兴隆、莫城、淼泉、古里、白茆、支塘、何市、董浜、徐市、珍门、梅李、赵市、浒浦、碧溪、吴市、东张、王庄、冶塘、练塘、张桥在内的共 22 个调查点;第二片,以沙家浜话为代表,包括唐市、任阳、杨园、辛庄在内的共 5 个调查点;第三片,以谢桥话为代表,包括周行、大义、福山、王市在内的共 5 个调查点。^①

二是城区方言与周围郊区方言的差异。这两个区域不仅语音系统有所不同,拼合关系也略有差别。词汇、语法方面同样稍有不同。

三是城区方言老派和新派的差别。从赵元任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1956)中记录的常熟方言到本书调查所得的语音系统,声韵母均已发生语音演变。

常熟方言作为北部吴语的一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见图 1.1),与属江淮官话的南通一江之隔,又与北部吴语的代表方言苏州紧邻。曾经的长江天险造成常熟与外界交流不便,但正因为较少的语言接触使得常熟方言保留了较多古吴语的特点,区别于周边地区方言。从图 1.1 我们可以看到与常熟毗邻的城市有:苏州、无锡、江阴、张家港、太仓、昆山。今与常熟接壤的一部分张家港地区原属常熟管辖,“现在的鹿苑、塘桥以南包括凤凰、西张、港口、妙桥、乘杭几个公社与常熟县毗邻,这里的话同常熟话类似”(曹剑芬、周维勋,1984:95)。邻近方言对常熟方言都有影响,造成常熟市内各地方言的差异。

^① 以上各地按旧行政区划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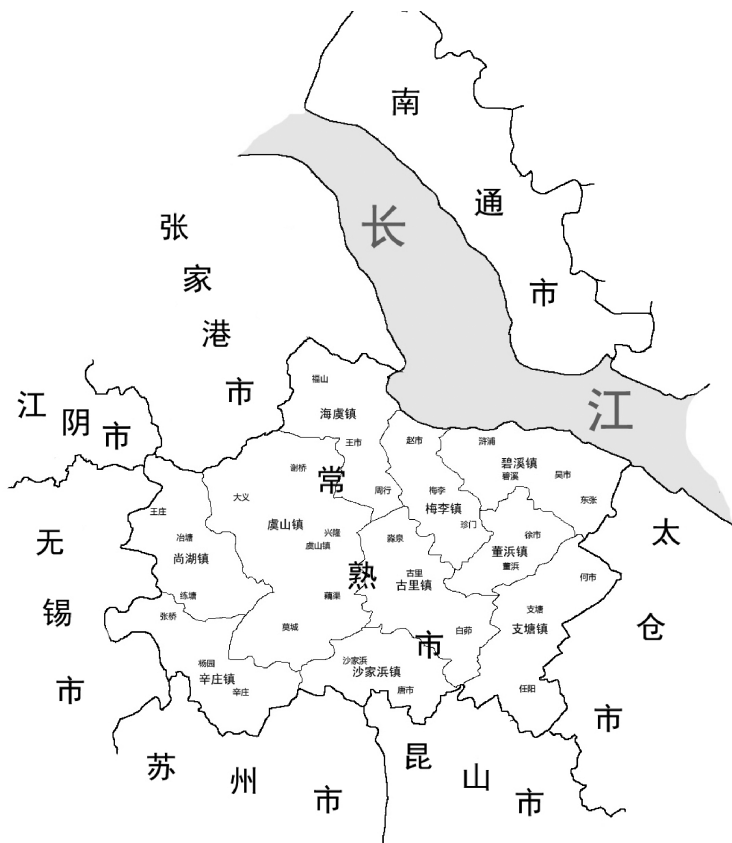


图 1.1 常熟市地理位置图

第三节 研究缘起

现代交通的迅速便捷和地区间交流的日益密切使得语言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汉语各方言之间的频繁接触,加之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不断深入,以及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也越发显著,因而,各方言语音面貌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

纵观汉语方言的历史,它的演变反映了汉语的语音历史,甚至是人文历史。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语言短时间内可以产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对日常使用的方言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记录、保存汉语方言的现实状况,同时可以追溯其历史和演变原因,推测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而在更大的语言环境中探讨人类语言的变化。

语音面貌的古今差异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造成语音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发音机制的原因,有语言内部的分化带来的语言上的变异,也有外部的、语言间或方言间的接触造成的结果。^① 语音演变是历时现象,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质,研究它无法像研究表音文字那样,直接从古代文献、拼写与读音的矛盾中发现语音演变的规律。汉语语音的研究在清代以前大多为对发音的大概描述和音类的归纳,对实际音值的记录较少。因此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情况和发展趋势,只能一方面通过对现有的有限的古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另一方面对活语言即方言的共时变异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语音的发展趋势。

目前看来,北部吴语的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都已非常丰富(仅指语音材料,对词汇和语法研究还不够充分),但是,至今还没有人把常熟方言的语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其音韵演变的特点,语音内部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对其一些古老的音韵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等等。常熟方言保留较多古吴语的特征,比如:吴语鱼韵的读音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鱼虞相混的层次;另一个是鱼虞有别的层次,它代表了吴语更早期的音韵层次。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切韵·序》中提到的江东方言“支脂鱼虞,共为不韵”是确凿的事实,在常熟方言中也能找到这个鱼韵白读层。同时,常熟方言中也存在鱼虞相混的层次,但有[y]、[i]两种读音,且呈现明显的年龄差异,老年和青年的y韵其来源与所处的层次是否相同?其变化是由系统自身演变造成的,还是由语言接触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类有关汉语语音演变规律和演变历史的问题,只能通过对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十分有限的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对空间上方言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共时的语音异读的研究,做综合性考量,才能建立汉语语音史,并探讨方言音韵结构的变化和演变趋势。

汉语方言丰富而又复杂,各方言间又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要通过掌握所有汉语方言来探讨汉语性质的方法实施起来十分困难。因而我们往往期望通过对单点方言的研究来揭示汉语的本质。本书即希望通过对常熟方言语音进行全面描写,厘清方言语音的层次结构,分析语音演变的来源和原因,把握常熟方言语音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再把它们放回到北部吴语研究中考察吴语演变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① 何大安. 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第四节 相关研究简介

一 常熟方言的研究现状

对北部吴语尤其是苏沪嘉小片方言的研究一开始就受到重视,从语音系统到词汇、语法,从概述型研究到地区间的比较和单点专项研究,成果颇丰。常熟方言也一直受到方言学者的关注,在不少语言学的著作和论文中,都有对常熟方言的详细描述或举例涉及。

关于常熟方言的语音系统,前人已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最早的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常州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这本书“对当时和以后的吴语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研究都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侯精一,2002:83)。《现代吴语的研究》“吴音”部分用图表的格式排列出《切韵》的某一音类在33个吴语方言点的具体形式,当然也详细记录了当时常熟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并且概括出常熟方言的语音特点,其中常熟方言知系声母和声调与邻近方言的显著差异在此书中早有谈及。同时,《现代吴语的研究》呈现出吴语的内部关系,这对我们纵向研究常熟方言的历史演变或横向比较常熟方言与邻近方言的共时差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地开展方言普查工作,就吴语而言,最重要的成果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写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9),该书划分了四个方言区,并分区描写了各自的语音特点和20个方言点的声韵调系统,绘制方言地图;同时将所有调查点的字音、常用词分别加以比较对照。常熟作为调查点之一,有完整的语音系统及音韵特点可供参考。

“文革”结束后至今,有关常熟方言音韵的研究成果较多。正当诸位学者对苏州话连续变调问题的讨论十分透彻之后,翁寿元先生对老派常熟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情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1988),同时又一次记录下当时常熟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尽管他对某些变调类型总结得不够精准,但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他所提供的常熟方言语音系统也成为研究常熟方言语音演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是对赵元任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所涉及的33个吴语方言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该书中对常熟方言有较为详细的比较



分析,重新描写常熟方言音韵系统,在对当代吴语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总结出常熟方言的一些特点。作为研究新派常熟方言的代表,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后问世的地方志也辑录了一些方言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比较简单,如《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常熟市志(修订本)》(2006)都有常熟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及相关音韵特点,《常熟市志》中还有词汇、语法的简要特点;与普通话的对比及声韵拼合关系;常熟方言的内部差异和演变趋势。但由于《常熟市志》中常熟方言这部分内容的编写者大多是非专业人员,其所列举的方言材料不够准确,只能作为参考。

有关常熟方言的其他相关问题,如对同音字汇、词汇、语法等的研究也散见于《方言》《吴语研究》等杂志和一些硕士论文中,如《江苏常熟练塘话的准体标记“开”——附论“得、过、脱、好”》(王建,2008)、《常熟话“勒×”结构及其功能分析》(袁丹,2008)、《江苏常熟梅李方言同音字汇》(袁丹,2010)、《常熟大义话词汇研究》(柏丽洁,2005)。

此外,对北部吴语的比较研究,如《北片吴语内部的异同》(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1984)和《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许宝华、游汝杰,1984)等文章中均有对常熟方言的论述。这些研究反映了常熟方言在北部吴语内部显示出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社会语言学研究,如马慧琪的硕士论文《常熟方言语音调查报告》,采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进行样本调查,反映常熟方言语音系统存在的内部差异。

大陆以外学者对常熟方言音韵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普林斯顿学派的学者 Ballard(1969)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撇开《切韵》,参照各地的语音形式直接构拟吴语的原始面貌。尽管不怎么成功,但其中有常熟方言的语音材料,这是研究常熟方言不可忽视的历史资料。张琨《论吴语方言》(1985)一文对吴语方言进行了综合性论述,其中对常熟方言声韵调的特点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除了对常熟方言的共时描写与比较分析之外,吴语研究者以史料钩稽早期吴语特征,探讨吴语的形成与发展的成果,一方面有助于比照常熟方言的历史演变情况,一方面也有涉及常熟方言的文献材料可供参考。比如石汝杰(2006:166)讨论《山歌》的语音问题时提到“虽然直到现代,在苏州的周边地区还残存着翘舌音,但在《山歌》中已有翘舌音和非翘舌音的混同例:烧(书母,效摄三等)一艖(生母,效摄二等)一骚(心母,效摄一等)”。常熟方言恰好与此话相符,“烧”为翘舌音,“艖、骚”同音与“烧”不混同。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知、

庄、章、精组字的声母演变情况。因此吴语史的相关论著对研究常熟方言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比如周祖谟(1966)探讨《切韵》和吴音的问题;胡明扬(1981)讨论《山歌》《挂枝儿》韵部的分合,构拟明末的苏州方言;李新魁(1987)著文探讨吴语的形成与发展;鲁国尧(1989、2003)利用《南村辍耕录》的材料研究元代吴语;石汝杰还著有一系列有关明清吴语研究的文章:《笑府》的明末吴语(1991),《缀白裘》的语言(1991),《韵学骊珠》的音系(1998),《型世言》的语言及校点问题(2002),等等。

纵观近二十年的研究情况,常熟方言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足和有待深入的地方:①常熟方言的语音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仅是声韵调系统和音韵特点的静态描述,或是在整个北部吴语研究的大范围下,提出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对常熟方言的音韵现象缺乏纵深的探索和横向的比较。②常熟方言总体面貌方面,已有的成果停留在单点的调查研究,只涉及常熟市区、谢桥、梅李3个点,全面的调查工作尚未开展。因此,对常熟方言内部的地域差异、分布特点缺少认识。③近年来吴语研究在历史层次的分析上较为注重,通过对方言共时层面上杂糅的不同语音层次的离析,比较各个层次的历史关系,探讨语音的演变规律。将层次的观念引入常熟方言音韵研究中可以更清楚的梳理常熟方言语音的结构演化和历史层次。④对词汇、语法的研究相对薄弱。

二 语音历史演变研究简介

历史语言学是在对欧洲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部门。^①它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找出对应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拟测原始语。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注重的是语音形式的系统对应,而不是其他的语言单位。对语音严格对应的同源词进行比较,从而确认语言历史谱系关系,为科学语言学奠定了基础。

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历史语言学退出主流地位,但语言学家运用结构分析法研究系统内部一些不规则的差异,从而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创造了内部拟测法。这就使原本历史比较法难以发挥效用的地方获得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因而推进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拉波夫的语言变异学说对历史语言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把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从共时的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



语言变异中观察历时的语言演变,解决了探讨语言变化原因的问题。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难以解释的一些不符合规律的现象和系统内部参差、杂乱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言演变的过程,为历史语言学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印欧系语言的文字是表音文字,因此历史语言学可以通过字母和拼写规则去考察语言的语音面貌。但对于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来说,历史比较方法在欧洲语言中取得的骄人成绩,在亚洲无法复制,因此光凭文字、文献材料不可能完善地建立语言史,还必须借助方言和亲属语言等活材料。而汉语复杂的方言差异便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高本汉关于汉语音韵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方言的语音表现同“历史上的旧材料”两者结合起来,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除了对历史语音进行构拟之外,还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某个方言语音的发展轨迹及不同方言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高本汉为汉语音韵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也就是在欧洲兴起的历史比较法和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的结合。继《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把语言的空间差异和时间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方法对汉语上古音、中古音及近古音进行构拟,并进行了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使汉语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王力的《汉语语音史》、黄典诚的《汉语语音史》、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等。而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董同龢、罗杰瑞和杨秀芳等学者最先用比较方法研究闽语”(梅祖麟,2003:16),张琨对嘉戎语语音进行历史构拟,王辅世对苗瑶语族语音的构拟,以及壮侗语和缅彝语等少数民族语音的构拟,都对汉藏语系的历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

历史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它不是对前一阶段方法的简单否定,而是突出旧方法的局限性,从而改进研究方法,使得历史语言学不断地向前发展,日臻完善。

三 方言地理学研究简介

方言地理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也称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或者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绘制方言地图用以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曹志耘,2002)。

语言地理学是语言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方言地图是语言学中独特而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语言学中许多问题研究的基础。方言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均与方

言地图密切相关,方言地图的发展演变是方言地理学发展演变的具体表现。

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语言地理学的发展,欧美各国投入巨大力量编制出版了方言地图集。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绘制了《德国语言地图》1册,发表了德国北部和中部的6幅方言地图。1902—1914年和1920年,吉叶龙(Jules Gilliron)开展了对法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他专门训练了一名叫作艾德蒙(Edmand Edmont)的调查者,设计了一份约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赴实地对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进行调查记录,最后编制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926年,芮德(F. Wrede)出版了《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8年起,雅伯尔格(K. Jaberg)、侏德(J. Jud)发表了《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也出版了《北美方言地图》。

在日本,语言地理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继由学者绘制本国的方言地图。1905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发表《音韵分布图》29幅;1906年,该委员会又发表《口语法分布图》37幅。1930年,柳田国男所著的《蜗牛考》一书,从日本各地“蜗牛”一词发音的不同入手,论述方言的产生、传播和变迁。1966—1974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了《日本言语地图》6卷;1989—1999年,该研究所又编制出版了《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

相比较而言,我国方言地图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利用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不小成绩。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刘复等提出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绘制汉语方言地图的设想。我国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4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该图由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提供,为汉语方言分区图。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则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收录的66幅方言地图(1938年成书)。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汉语方言研究中,在大同、宣化等地进行方言民俗调查,于1945—1958年间发表了多篇运用语言地理学研究汉语方言的论文。此后,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和方言研究论著都使用方言地图来解释方言分区或描写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单点方言地图集,如王辅世的《宣化方言地图集》(1950年成书,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稿)》(1992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中有24幅地图,280个方言点,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中国社会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辑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8]是第一部专门的中